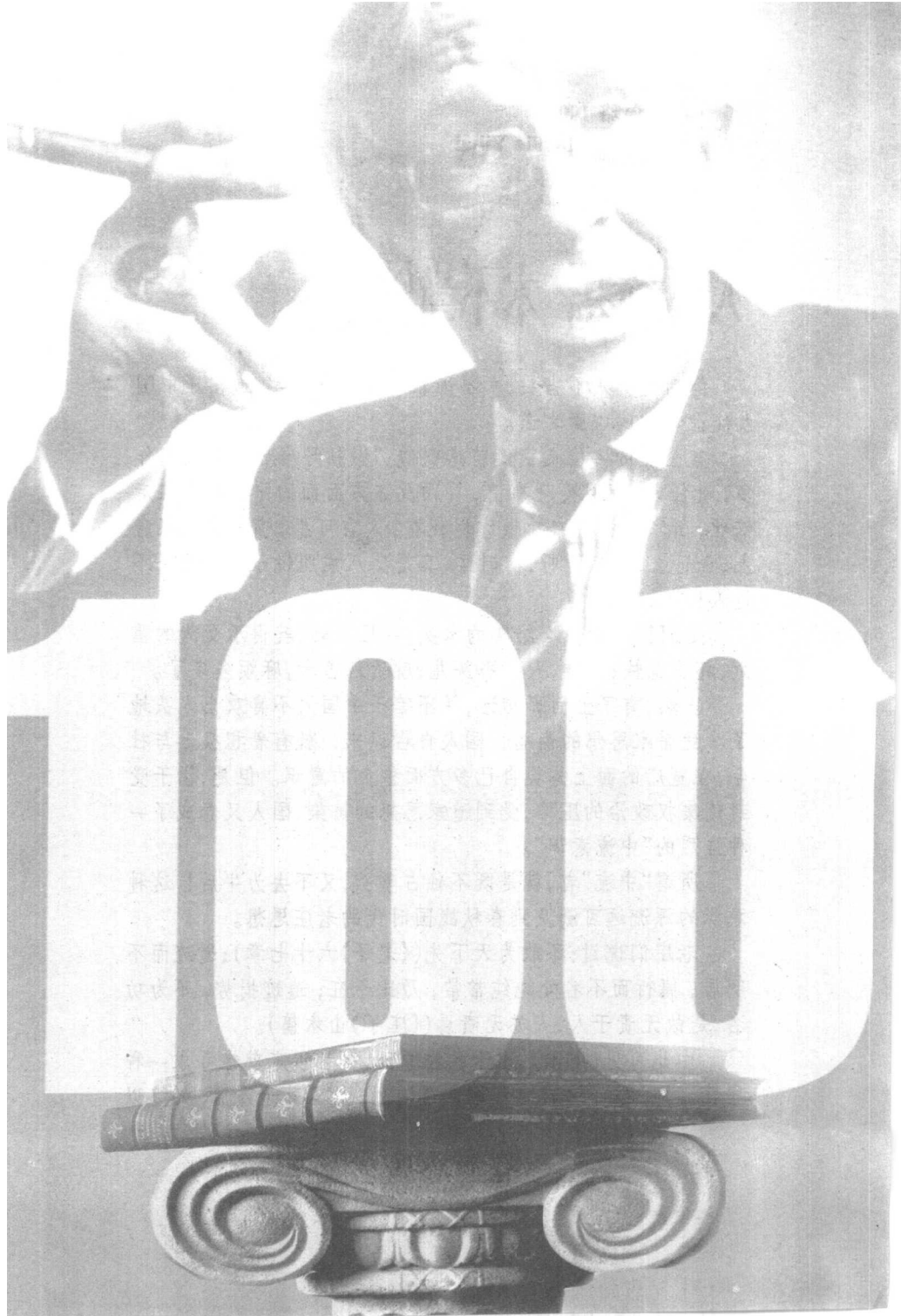




人不当头,木不当轴

俗话说：“人不当头,木不当轴”，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中国人处世哲学的中庸之道。

某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曾感叹道：“做领导难啊！不仅工作多，责任大；而且处理事情，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平衡！像在走钢丝，弄不好掉下来摔散你！还有，人言可畏，嘴长在人家身上,说什么,你都得听,有时候,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是啊！不管多么结实的木头,一旦当轴,就得承受大的重力,坏得也快！同样,人一当头儿,就责任重大,麻烦多多了。

当然,有了上面那句话,并不等于中国人不喜欢出人头地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积极参与社会,在宽广的面上体现自己多方面抱负的意识。但是,由于受封建集权政治的压抑,受到道家思想的熏染,国人又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中流意识”。

所谓“中流”者,就是既不独占鳌头,又不去为牛后！这种意识的源流远可溯及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庄思想。

老庄们说过：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逍遥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庄子》山木篇)。

由此可见,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自古以来就在寻求一种平衡。即：既不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又不落于人后,始终以



隐隐约约的个性，行居中游。

顺便说一下，这种意识，也不无佛教之‘中道’思想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流，再加之封建中央集权的高压政治，最终造就了这种处世哲学。

尅守如此哲学，无庸讳言，其人生道路是不会有太大麻烦的。相反，如背道而驰，其结局必然就惨了。历史上的鸿儒大贤、忠臣良将，得善终者有几人？宋代范仲淹进言遭贬，左迁洞庭，尤“进亦忧，退亦忧”，然则，其忧期渺渺，一生湛湛，倒弗若李白、嵇康、陶渊明等或出没官场，或退入山林，进退自如，平常常来得洒脱，自在！难怪李白要高吟“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了！

“不当头儿”是中国人处于乱世的最佳智慧。不过，这种意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惰性”！大家都甘居中游，不愿多出“风头”，那么，整个社会就死气沉沉，停滞不前了。清朝搞了数十次文字狱，国人文士噤若寒蝉，眼看着国力衰微，难怪龚自珍发出了“万马齐喑”的悲叹！再看“四人帮”时期，大搞“一言堂”、“家长制”、“批孔批儒”，更有哪个文人敢当“出头鸟”？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又该对“人不当头、木不当轴”，作何感想呢？

人怕出名,猪怕壮

为什么猪不可以太肥呢？因为太肥了就要被人杀了吃。

《韩非子》中记载着这样一则寓言：

寄生在猪身上的一群虱子展开了争论。“唉！你们总是吵来吵去，争个什么呀！”另外一群虱子跑来劝架。

“没有呀！我们只是兴奋找到好的寄生处罢了！”

“算了吧，到了 12 月祭典，人们烧起火来，把这猪作烧烤，看你们还有没有时间在这嚷嚷！”

于是，这些虱子拼命地吸吮猪的血，结果猪瘦下来了，在 12 月腊祭那天，猪才免去一死。

同样，人越出名，遭到的横祸也就越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平衡感，但是为什么对“出名”是如此敏感、谨慎呢？

就此，宋代理学者程川就有所谓‘三不幸’之说：

“少年登科一不幸，依仗父兄权势作官二不幸，才高八斗，能文章三不幸。”（《伊川文集》）

这话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仔细咀嚼起来，不无道理。一个人若因为有一技之长，或才华横溢，整日被人从早捧到黑，那他肯定不会安身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招惹了许多是非。轻者徒添麻烦，重者还会丢掉性命。人们说‘树大招风’，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历代名人辈出。但是，凡



是尅守明哲保身的，总是在出名的同时即防备着随之而来的，可能产生的不利。这种思想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人不当头”思想一样，也是缘起于老庄思想。造成它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是，从某个侧面，似乎也反映出了中国古老社会、组织、集团内部嫉贤妒能，相互牵制之情性文化的实质。

《战国策》中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魏王赠送给楚怀王一名美女，怀王对之恩宠有加，不觉就冷淡了后宫诸宫女，嫔妃。怀王本来一直宠爱一名叫郑袖的妃子，这次突遭冷落，自然嫉妒得发狂。但她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反而主动与那美女套近乎，把她视为自己的亲妹妹一般。这样，她既笼络了美女，又混淆了视听，使怀王深信自己大度。时机成熟后，她便设计让该美女见到怀王时掩鼻，说是怀王厌其鼻貌，美女以为然，照做如如，怀王对之不解，问于郑袖，袖故作迟疑，语言支吾。怀王更欲知晓，于是袖谎称美女恶怀王体臭，怀王大怒，便将该女施以刖刑，不再有被宠的资格了。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就不乏擅于运用计谋残害他人的无耻之辈，一个人一旦出名，便惶恐不安，这并非杞忧。相反，定会受到以上郑袖们的陷害的。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屈死于秦桧之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养兵是为了打仗、保家卫国或攻人城池掠人土地。为此需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否则胜败之数,很难料定。

养兵打仗,固然需要谋略在前,但是,需要事前准备的,却不只限于战争。仔细想来,凡是人类要做的万事万物,都是需要运筹再三的。相反,如以‘临急抱佛脚’的态度处理事情,其败数之大,已属情理之中了。

中国成语中,有“临急抱佛脚”一词,其相通的说法还有“临渴掘井”“临难铸兵”,等等。

“临渴掘井”现已是妇孺皆知的俗语了,其出典是一本古医书《素问》,据该书载:

“病已形成才服药,乱已形成才求治,这就像渴了才挖井,大难临头时,才去铸造兵器一样,为时已晚了!”

一名医者,借助‘临渴掘井’‘临难铸兵’的比喻,劝戒人们有病之前须讲究养身之道,也可谓具有战略眼光了。

是啊,与其病重去求医,不若平时就注意身体健康。做其他事情,也是同样道理,须明白,若危机已出现才草草应对,事已晚矣!

另外,关于‘临难铸兵’;《晏子春秋》中也有一则故事:

很久以前,鲁昭公亡命于齐。一日,齐景公问昭公曰:

“你年纪轻轻就即位,即位不几天就亡命于他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昭公答曰:“我一向受众人喜爱,但是,现在喜爱我的人都



离我远去。因为，他们都会极力劝谏过我，而我只当耳边风，不认真听听了，也是敷衍，不去付诸行动。结果，周围只剩下逢迎拍马，协肩谄笑之辈，而没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了。我的情形就如同一棵秋草，乍见之下，身边似乎是花团锦簇。可是，之于我最为重要的根，却是孤立的。因此，当秋风劲吹时，我就不堪其力而折断了”。

景公将这话传给后来升为宰相的晏婴，并问：“我想竭一己之力助昭公返回王位，该如何是好？”

晏婴回答：

“这是不可能的。失败了才知道后悔的人，是愚蠢的人。比如走路，事先不知问路而随意走动，迷了路才向别人打听！过河不知事前测量水的深浅，溺水后才后悔不迭，这就像遇到强敌绝境，兵临城下才去制造兵器，渴了，才去挖井一样，不管他多么诚恳、积极，已经来不及了呀！

晏婴这段话说的也是事前准备的重要性，有人说‘边干边想，边做再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而言，不加运筹的行动，都偏废于盲目，失败是常有的。此外，《左传》中‘有备无患’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对于生性急躁的朋友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否应该谨记在心呢？

不贪便宜,不上当

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曾说及‘君主可以致国亡’的罪状,其中关于‘因小利而失大’的题目下,引用了这么一件历史史实:

春秋时,晋献公欲借道虞国而伐虢国,问计于诸大臣。荀息献计道:“只要我们赠送虞王以垂棘之玉,屈地的名马,相信他会同意借道的。”垂棘是名玉的产地,屈地是名马的产地,两地的玉和马都是享誉诸国的稀罕宝物,开始献公恋恋不舍。他说:“垂棘之玉是祖先传下的宝贝,屈地之马,是我不可多得的名马,倘若对方拿了我的这两样宝贝而又不借道于我,将如何是好?”如果,他不愿借道与我,就不会接受我们的东西;只要他接受了,就肯定会借路。路借给我们,东西也就该归原主了。宝石放在家里家外都是宝石,名马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名马,只是权且让他们保管一下而已,请大王放心。”爱卿所言甚有道理,那就这么定吧。”于是晋献公就以荀息为使者,赠玉和马予虞国公,请求借道。虞国公一看名玉和良马,心花怒放,便想马上接受。虞国也并非缺乏贤能者,有一重臣宫之奇听到此事,便进言劝止虞国公:“此物万万不可接受,虢国对于我们来说乃是同姓之国,尤如枝木之于车轮一般重要,枝木与车轮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的,虞虢两国是互为存亡的。大王一旦借道给晋,虢国亡国之日,恐怕即是虞国的末日了。总之,请大王三思,千万不可接受啊!”然而,虞公未能摆脱利



诱，毫不听取宫之奇的劝诫。荀息伐虢后，三年后又发兵攻虞。虞大败而亡国。荀息索回原来的玉和马，奉献于献公：

“玉仍是原来的玉，马似乎比以前更壮硕了些呢！”

献公大喜。

韩非子介绍完上面的故事后，发了一段感慨：“为何虞败亡国呢？主要就是利欲熏心，贪图眼前的小便宜。可见贪小便宜上大当啊！”

就是说欲望里有陷阱。

因小失大的例子不只是虞国公，《韩非子》中又举了另外一则故事。

举父嫁女时，语于女儿：“尽量多存私房钱吧，防止哪一天被休呀！”

于是，女儿便在夫家大敛其财，不久事发，被赶了回来。带回的东西，比嫁出去时还多，该父还不醒悟，反而因敛了一笔财产而沾沾自喜。

对此韩非子评说道：“现在的政治家就与那个贪心的父亲一样！”

除了《韩非子》里的故事，因眼前小利而失大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如今商品经济大潮中，到处有诱惑，到处也有陷阱，切记：勿因贪小而失大呀！

不上高山，不显平川

从各个方位周密地思考，是一种最好的思维方式。因为只囿于一个角度看问题，容易判断失误，因而招致失败。思考问题，作出决策，因常常更换视点、角度而能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因此，遇事在注意其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与之相伴生的害处。一句话，即要兼顾利害得失。

关于这一点，古贤者庄子也有过失败的教训。

某日，他正在深山享受打猎的乐趣，忽从南方飞来一只奇怪的鹊鸟，翼宽七尺，眼开一寸。它掠过庄子头顶，停驻于不远的栗树上。

“真是一只奇怪的鸟呀！有那么宽大的翅膀却不飞，有那么大的眼睛却看不清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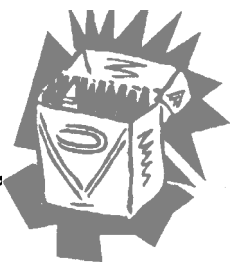
说着，庄子就进入栗林，当他举箭瞄准该鸟时，发现它正专心地捕捉树枝上的螳螂；而那螳螂又在专心于树枝下吱吱叫着的蝉。螳螂因一心想着抓眼前的猎物而忘却了身后的敌人，而鹊鸟呢，也是同样，看到这种情形，庄子不禁悚然。

“到底是猎捕别人，还是被人猎捕呢？只顾眼前利益而盲目行动，实在太危险啊！”

于是，庄子急忙丢掉弓箭，跑出栗林。可是就在此时，从他身后跑出来守林人，硬说他是偷栗子来的，结果被人狠狠地羞辱了一通。

《韩诗外传》中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楚庄王欲动员大军攻打晋国，召开重臣会议，武断地说：



“好了！攻打晋国的事，我已决定了，
敢再谏者死！”

此时，孙叔敖挺身而出，说：

“若因害怕鞭打而不敢进谏于父者，不可谓孝子；因恐诛杀而不敢进谏于王者，不可谓忠臣。因此，欲保忠臣之实，在下特进谏大王。”

说完，他又劝道：

“我院子里有一榆林，前天，我在林中偶而发现一只蝉，它刚引吭高歌完毕，正欲去饮那露水，这时其身后却有一只螳螂，正作捕食之势，可蝉对此毫无察觉。然而，螳螂也没有发现在其身后有只黄雀早已瞄上了它。同时，一心只想捕食螳螂的黄雀更未发觉，树下正有一孩童正张着弹弓向它瞄准。而那孩童心迷于那只黄雀，忽略了脚边的一个大洞。他们都只为眼前的利益所惑而不顾身后的危险呀！现在晋国未衰，而大王欲讨之，情形不也是一样吗？”

听了这段话，楚庄王终于收回了成命。

当人的心被某物所虏时，该物的形影就会在人心膨胀，而最终使人迷失了自己，不顾利害得失的全面性而匆匆行动，受挫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遇事一定要全方位地思考，“不上高山，不显平川”呀！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这是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国后，贤相耶律楚材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耶律楚材文功卓卓，贤过周召二公、魏征程普。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超。

在当时特别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作法。但是，至于它能发挥多大实际功效，倒是适时而定的。它的最大特点，即是回避政治上的破绽，将不利点降到最小程度，当然这不是治本之策，甚至有隐藏事实真像的嫌疑。这种作法也应了李宗吾先生厚黑学上的“锯箭法”。

总之，这种作法在当时是适时的。但是它的弊端也是客观存在的。耶律楚材无法想到它对后世的影响，更不知是否会被二三流的政治家模仿的危险性了。

中国人向来就是受平衡感支配的民族，不管在政治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就是所谓“中庸之道”。这种“道”，却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韩非子》中有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某夫妇求神祈愿。为妻的求道：

“请赐给我百匹布吧！”

“这样太少了把？”丈夫提醒道。妻子说：

“若求得太多，恐怕你要养妾呢！”

可见，不光是一流政治家在治国上，在兴一利时考虑除一弊，这种观念也已深入到寻常百姓心底里了。

另外，还有这样一个笑话：

某男子因厌倦贫穷而向苍天祈祷：

“我不求做大富翁，但求我日日可温温饱饱、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他的虔诚感动了上天，神明竟现身对他说：

“为什么不祈求奢侈一点的生活呢？你现在过着可有可无的生活，够逍遥了。你再要求自在，恐怕难以答应你了，想好了，到底是维持原状，还是过富人的生活？”

以上两则故事，都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它与四平八稳的平衡感如出一辙。在维护心理平衡、修身养性上，甚至在维护政治统治上，它都起着很好的效用。但是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平衡过了头，会淡化问题的症结，矛盾的所在，甚至会养痍遗患，造成危机。

大富由命,小富由勤

“命”,又称“命运”。更有“天命”之所谓。可见“命”与“天”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认为人道与天道二者合一。天道、人道之所以存在,乃因天支配了人的福祸、贫富和天寿。因此,所谓的生命、性命、命运的说法,皆衍生于“天命”说。“天命”说认为命运是由天意决定的,凭人的毅力和努力都无法改变它。

对此,古代的中国人是深信不疑的,认为这就是生存的依据。不管是“天”或“命”,对他们而言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宗教意味。

儒家经典中谈到“命”的有很多。如“乐天知命,不知愁”(《易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等,这些都变成俗语了,人人会用。我们暂且不论“命”是属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课题,但就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而言,它并不是与人的生活无关的无稽之谈。

中国人对于命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这与他的行动也息息相关。古人凡遇不测之事,每每推定为命运、天意而采取放任、抑或牺牲抛却自我的态度。如汉高祖刘邦,晚年曾为流矢所伤,伤势日益恶化,奄奄一息。皇后吕氏诏示天下,广求名医。医生为刘邦诊断后,刘问:“我的病情如何?”那位名医回答:“皇上只管安心养病,会治愈的。”然而,刘却大发光火,咆哮起来:“你在说什么疯语!我一介布衣出身,以三尺之剑定天下,乃是天命如此!人命乃由天命而定,我现在大限已至,

即使扁鹊再生，也无法医治我的伤了！”
说完，拒绝医生为他治疗，而以 50 两黄金将医生打发走了。高祖的伤势更加恶化，终于死去。



可见“天”与“命”之于古人，是何等有威力。这种意识到了现代中国，正如《新华字典》中解释的那样，被认为是一种迷信，年轻人中相信命的人见少了，可是仍不能说这种意识已绝迹了。宗教也好，迷信也罢，很难以好坏界定它。如果抛开其愚昧的封建糟粕性的成分，还是有其长处的。

人们普遍地对自己的“命”有所自觉，就较为容易地掌握心理平衡。当遇到突如其来的挫折、打击，抑或无法顺心的事，就可以把它们推卸于“命”，反而能获得解脱，减轻精神压力。因此，“命”说在教化上起到精神安定剂的作用。何况“小富由勤”呢？“命”说也不完全排除人的主观能动性，大的方面，无以跟命争，但在小的方面，通过努力是可以局部达到满足的。这对向来追求平衡、安定的国人来说不失为最好的精神支柱！

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屡屡遇难，而他老夫子每每以“天命”自慰，最终奠定了大儒的基石。在当今社会，这种思想从平衡人类心理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它是“科学”，至少比西欧的精神分析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君子不跟命争

当说人不自量力,鲁莽行事时,经常使用‘螳臂档车’这一成语。

《庄子·人间篇》中有‘汝可知螳螂,触之以臂而怒,以为可以挡车,殊不知其力不敌。’这句话恰可用来讽刺那些不知自己有多少斤两而又随意乱发意见的人。

另外《韩诗外传》中也有一故事:

以前齐庄公出猎时,见一只螳螂直向庄公乘舆的前车轮而来,庄公大叫:‘停车 那是什么?’

左右御者答道:“那个东西叫螳螂。是一种只知进不知退的小虫,常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而一味地向前冲,作出与人拼力的样子,实际上一战即被消灭!是一种无知的动物!”

“它若为人,应该是天下的勇夫吧?”说着庄公故意绕过螳螂而过。

齐庄公可谓有隐忍心的君主,他虽然同情螳螂这种敢于进攻,置生死于不顾的精神,但对于它的行为却并不欣赏。深知它只不过是一种有勇无谋的“勇夫”而已。

“无谋”即是没有‘城府’,不懂计算、测量、运筹。对这种人,国人向来是持鄙夷态度,视之为“匹夫之勇”、“不足畏惧”。孙子更蔑视这种行为是“暴虎冯河”。

某次,孔子问颜回:

“一旦被录用,却要全力发挥自己的才干,否则,就静观待

之。像这样穷居陋巷尚能安然自得者，恐怕只有你和我了吧？”



坐在旁边的子路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生气地说：“若是这样，老师您如果有一天作了某大国的丞相时，会认为什么样的人值得信赖呢？”

子路是个非常勇猛的人，在孔子三千学生七十二贤者中，其勇力和胆识是独一无二的，他之所以这样问，是想证明他的实力，话语中颇有挑战意味，或许此时他希望老师回答：“当然是你这样的了！”然而孔子却坦然地说：“像暴虎冯河那般不知天命的人，我是万万不会托以重任的，倒不如那些小心谨慎，计划缜密的人可信。”

孔老夫子已看出了子路的心思，在此不点名地批评了子路，暗示他只是有勇无谋，不如颜回稳重老练。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孔子等贤者，中国人大多有此共识。

自古以来，儒家就提倡崇文而轻武。这一点从封建统治的结构也可窥见一斑。历代武将都受制于文官，实际操作国家政治的宰相、丞相，向来是文人占绝对多数。即便是武将，也要求有文韬武略；‘匹夫之勇’绝无成大将之可能。

文，代表智慧、策略。懂文韬方可称之为君子。君子向来善于经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因此足以凭信。